

容闳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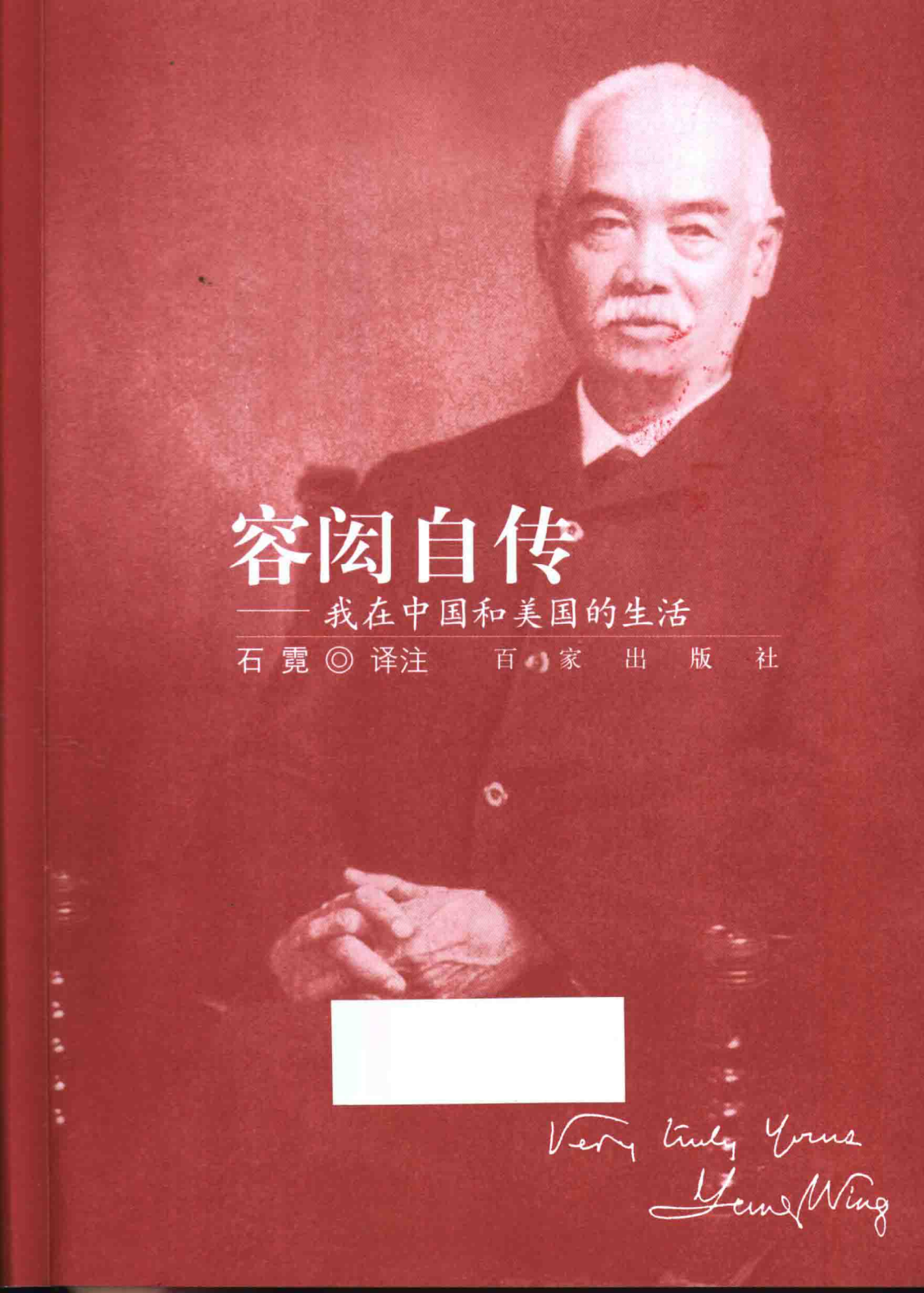
我在中国
和美国的生活

◎ 美国一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

◎ 彻彻底底的爱国者

石霓◎译注 百家出版社

A portrait of Rong Yin, an elderly man with a mustache,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tie, with his hands clasped.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dark red color.

容閔自传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石霓◎译注 百家出版社

A white rectangular redaction box covering a portion of the lower half of the cover.

Very truly yours
Yung W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 石霓译注.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 8
ISBN 7 - 80656 - 851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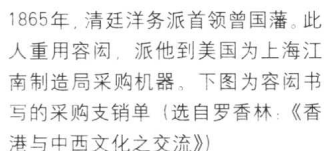
I. 容... II. ①容... ②石... III. 容闳
(1828~1912)—自传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204 号

书 名 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译 注 者 石 霓
责任编辑 丁翔华
特约编辑 季永桂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页 6
字 数 284 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56 - 851 - 4/K · 9
定 价 1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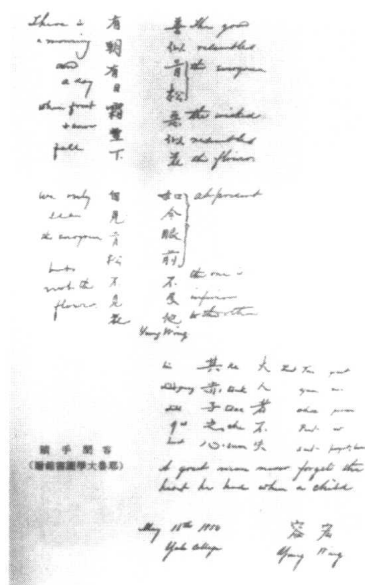


容闳故居遗址（南屏镇西大街三巷1号）





1854年，容闳获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时的照片



容闳在大学毕业时写下的格言（耶鲁大学图书馆供稿）



美国纽约容闳公立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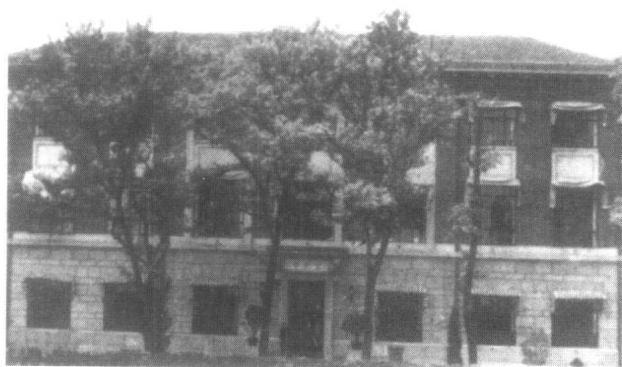
主持留美教育时的容闳



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詹天佑（左）与梁敦彦（右）



1872年第一批赴美国留学幼童出发前在上海的留影



上海交通大学于1933年兴建的容闳纪念堂

MASS 52



容闳于1871年倡办的南屏甄贤学校



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路易莎·凯洛格(Mary Louise Kellogg)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
 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
 以閒為自在。將壽補蹉跎。
 春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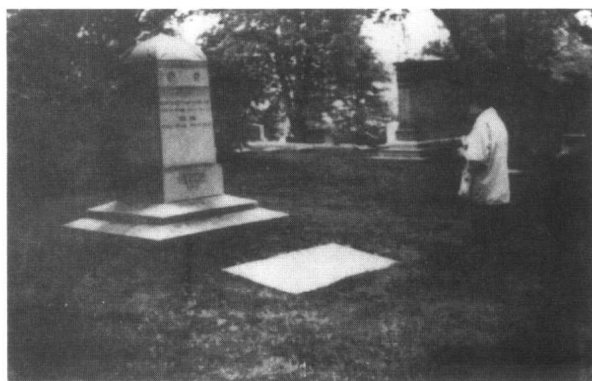
容闳于1887年新年写下此诗，以表达他当时痛苦和孤寂的心境。



容闳在美国康州为中国学童设办的学堂



晚年的容闳在美国寓所



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市容闳的墓地



前 言

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署名 Yung Wing。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人。生于1828年11月17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卒于1912年(民国元年)4月21日。他于1909年完成的英文自传性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全书共二十二章,并有“自序”一篇。还附有其美国友人杜吉尔牧师1878年4月10日的演说一篇。他从自己出生那年(1828年)写起,一直叙述到1902年止。自述其童年在澳门接受启蒙教育,至澳门、香港两地的少年学习生活,再至美国留学八年。接着叙述他1854年学成回国后为实现心中的理想——使祖国文明富强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追求历程以及为此所从事的教育、外交、经济、政治等活动。自述其经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军、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以及投身于洋务事业、维新运动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1909年11月,该英文著作由美国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曾由徐凤石、恽铁樵用“新民体”节译为中文,书名为《西学东渐记》,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按此译本校点重印,并补译容闳的“自序”和杜吉尔牧师的演说,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中译本尚有中华书局于1991年出版的王蓁译的《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此外,1969年日本出版了日译本容闳自传(百濑弘译注、



坂野正高解说)。至于本译注的出版,完全是因撰著《容闳评传》而作。在撰写《容闳评传》中,深感资料不足,更深感对容闳思想把握不够,强烈的想法就是亲自细读容闳英文自传,因为它毕竟是容闳生前最主要的著述(尚有其他零星手稿散见于各处),这是更好地把握容闳思想、观念和人格的关键。又幸得美国高宗鲁先生赠送我一本容闳英文自传——一件最珍贵最美好的圣诞礼物。于是我进入了容闳的自述中,用我的心去与他交谈,用我的心去理解他的语言,用我的心灵去感受他的心灵。就这样,边译边注,便完成了本书。

我将容闳英文自述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我从始至终都在感动着。与其说容闳是在追忆他所逝去的大半生的生活岁月,不如说他是在淋漓尽致地剖白自己的心灵,他的语言朴实真挚,谈及家庭甚少,通篇流淌着他对祖国的热爱、眷恋和向往,袒露的是他那一颗炽热坚贞的赤子之心。正如他1901年抵台湾,面对时任“台湾总督”的日本将领儿玉源太郎时毫无畏惧地表白的那样:“我完全处在你的控制之下,只要我希望这样的话,可以随时将我送交给我的敌人,我随时都准备为中国而死,只要死得其所。”正是因为宁死不屈地热爱着祖国,他才对祖国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他才为祖国的富强和他的人民的安康幸福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因此我感到,无别的语言,惟有用“赤子”来涵盖容闳才最为妥当,容闳是赤子,是赤子容闳。

容闳在出国留学前已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活了十八年以上,他与家庭及故土的情结业已形成,祖国的概念已经清晰,这是他之所以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最终铸就他一颗赤子之心的,正是后来的继续教育,他说“因为教育的的确



确已扩展了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进而启示我应负的种种责任”。不过,爱国无需要理由,如同爱自己的母亲一样,不需要理由,不爱自己的母亲才需要理由。一个中国人热爱中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容闳热爱中国的方式跟传统中国人的不一样,后者的方式几乎都是百变不离其宗,就是维持中国陈陈相因的肌体,绝不可触动。容闳则是要触动中国的肌体,使已衰老腐朽的老大帝国焕发青春,获得新的生命力,变成文明强盛的国家,居于世界先进之列,不再任凭西方列强的欺辱宰割。他采用的方法,就是用西方先进文明作为新鲜血液持续性地注入中华老大帝国的肌体,使之完全获得活力。其具体办法就是让中国年轻一代像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从而“将西方教育移植应用于东方文化”,实现中西文化的交融,进而达到复兴中国的目的。这就是他在大学期间形成的教育计划,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对此,他叙述说:

“整个大学期间,中国的可悲状况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令人痛惜的一幕幕,使我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年,我的心情则更感压抑。每当我消沉失望时,我就常常希望自己要是从未接受过教育多好,因为教育的确已扩展了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进而启示我应负的种种责任,而这些责任决不是那些愚昧无知、闭目塞聪的人能够感受得到的,而人类的苦难和邪恶,也决不是那些没有教养、冷漠无情的人能够敏锐感知的。一个人懂得的知识愈多,他的痛苦就愈多,必然地,他的快乐也就愈少;反之,一个人懂得的知识愈少,他的痛苦就愈少,因而他的快乐也就愈多。可是,这种人的的人生观是卑下的,其感情是怯懦的,决不属于品德高尚的人,实不足以称道。为了获得



教育,我远涉重洋,凭借勤奋刻苦和自我克制,我终于在竞争中达到了渴望已久的最值得追求的目标。虽然我所学到的知识没有理想的那么完满均衡,还不那么令人满意,但我完全合乎大学普通教育的标准,完成了大学文科教育的计划。因此,我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已受教育的人,而且就以此种身份,我应该问自己:‘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于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略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the rising generation of China)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而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时刻指明我前进的方向。我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1854年到1872年这长长的岁月里,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也不管人生的浮沉盛衰,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不渝,为圆满完成这一目标,我一直在苦苦地努力着,默默地期待着。”(第五章)

为了实现心中的目标,他放弃留在美国谋求优越地位的机会,于1854年一毕业即返回中国,历经18年,直至1872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但这一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究其根源,是老大帝国的守旧势力太强。

容闳不仅与传统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截然不同,而且与其他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先驱者也存在根本不同之处。他从童稚之年直至青年的求学经历,使他具有逸出群体而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在毫无封建专制根基的美国多年的文化熏陶并接受系统的西方文明教育,更使他成为一个异数。不同的文化背景,



塑造不同的世界观,他早已具有民主、自由和共和国的思想观念。他的这一思想观念最迟是在大学时期形成的。例如他1854年大学毕业时,其同级学友给他的临别赠言是:“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愿你回归天朝之时,将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而你将参与获致推翻压迫的胜利。……我深深相信亲爱的闵,你为促进那里伟大的自由之树生长,将起重要的作用。”^①另一位同级学友赠言是:“我有理由常常想起你,因为你有善良的心灵与善良的感情。我希望你为自己展布的生命之线不要过于炽热。当我冥思我的级友的好运时,我将常常深深思念你,你为人民谋求福祉的光荣使命。获悉(因为我希望获悉)你的故土从专制统治下和愚昧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欢乐,将因为知道你,我的亲爱的闵,曾经分担这份光荣的工作,而更为增强。愿上帝保佑你,愿成功与你相随。”^②显然,这些赠言是针对容闵的思想和抱负的。毫无疑问,容闵那时的思想观念是与其美国同学们一致的,并且他已树立起相应的奋斗目标。不仅如此,他在大学期间还时常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显示出“具有治国之才的特性”。又如当太平军势力到达长江流域并定都南京时,容闵于1853年7月27日写信给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请立即告诉我这次革命的情况,我对它所有的活动都极感兴趣。”^③足见容闵对中国国内时局的极其关注,他意在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也正

①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闵文献述评》,载于吴文莱主编《容闵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页。

②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闵文献述评》,见《容闵与中国近代化》,第576页。

③ 1853年7月27日容闵致卫三畏函,英文未刊手稿,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转引自袁鸿林《容闵述论》,《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是这一思想,驱动着他为革新中国、为追求祖国文明富强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了一生。

但人们评价容闳,说他可贵在于“与时俱进”,似乎是说容闳能跟上时代潮流,或是说他的思想能紧随国内那些先进思想家的感召。显然这不尽符合容闳的思想发展轨迹。事实上完全可以说,容闳的思想比同时代的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先驱者要先进和超前得多,也就是说他在1854年大学毕业之前,他的平等、自由、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成熟。即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也无法与容闳相比。只有孙中山,容闳与他的思想才真正发生共鸣,俩人终成为推翻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志同道合者。如果说容闳“与时俱进”,那只能是指他从未泯灭热爱中国之心,从未停止拯救中国的努力;如果说容闳“与时俱进”,那也只是手段上或策略上的与时俱进。容闳始终在寻求新的更为先进的政治力量作为依靠,以帮助他逐渐接近自己的终极目标。他最初依靠的是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势力。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势力兴起,他随即投身进去,无所畏惧地,全身心地;后来他愤然与康有为等改良保皇势力决裂,而投身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总之,他始终在寻找拯救中国的力量和希望,也始终满怀希望地在寻找先进的力量以拯救中国。虽然失望太多,但愈挫愈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容闳回忆录终止于1902年,并且1902年的活动也未详述,而他完成自述写作则是1909年11月,为何不叙述至1909年?为何要留下一段空白?这是令人揣摩的。有资料表明,容闳早在1901年之前就开始写回忆录了。如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记录年轻时的他在1901年避难于香港时拜见容闳的一